

#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家庭关系变迁

龚 维 斌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考察了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过程中家庭关系的两个方面——情感关系与权力关系——各自的变化状况以及相互影响的变迁过程, 认为劳动力外出就业对传统的家庭关系有较大影响, 建立在感情与权威基础之上的现代型农村家庭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家庭成员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关系及其成员之间交往的情感关系两个方面。由于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不同, 因而家庭关系具有不同性质, 具体表现为控制支配与民主平等两种形式; 由于家庭成员在利益、性格、情感、心理、文化、观念、道德等方面的一致与差异, 家庭关系的融洽与和睦状态又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亲密、一般、疏远、排斥等几种交往程度有差异的关系状态。那么, 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家庭关系的这两个主要方面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我对安徽省无为县赫店乡, 特别是对该乡的牌坊行政村的调查, 以及我参与的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1994 年对四川、安徽两省 4 县的个案访谈资料(杜鹰、白南生, 1997)。

## 一、情感关系

已婚劳动力外出就业是为了家庭整体利益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具体有两种外出方式, 一是夫妻一方外出, 另一方在家种地看孩子; 二是夫妻双双外出。由于外出就业十分艰辛, 因此无论早期还是近期, 一起外出就业的夫妻基本上都能保持良好的情感关系, 甚至在外出就业的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过程中加深了理解, 增进了感情。无为县赫店乡外号“蛇王”的汪嘉财<sup>①</sup>曾经几次经营失败, 但是每一次爱人都是与他一起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因此他说, “虽然我现有点钱, 但我和爱人是患难夫妻了, 所以感情很好。”夫妻一方外出就业则情况不同, 夫妻区位距离增大, 互动减少, 继续社会化程度不一, 人际交往范围不同等因素, 会对夫妻关系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所以下面主要分析夫妻一方外出就业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关系。

### 1. 没影响与好影响

在劳动力外出就业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 大多数家庭是以丈夫外出就业为主, 而且收入也普遍有限。安徽和四川两省农户访谈资料中, 谈到夫妻关系的 17 个夫妻一方外出户(都是丈夫外出)中有 14 户丈夫明确表示自己外出以后老婆在家十分辛苦, 言谈中流露出对妻子的理解、肯定与体恤, 表现出深厚的夫妻情义。尽管有人说“外出后对夫妻关系没影响”, 实际上“没

<sup>①</sup> 汪嘉财夫妻俩在外闯荡多年, 以做水产生意为主, 近几年一直在北京经商。1996 年底他们在家乡投资 60 万元建起一座“蛇鲜楼”, 经营餐饮娱乐业。

影响”是指没有坏影响,相反倒有一定好的影响——增加相互理解、相互体恤、增进感情。有1户妻子对谁外出有不同意见,另一户妻子不愿再让丈夫外出,这两户丈夫外出对夫妻感情并没有坏影响,夫妻之间的意见分歧在是否需要外出和哪些人外出上。只有一户因丈夫外出放蜜蜂而与别人重婚的负面影响例子。当人们还在为生计奔波的时候,很少有时间去考虑感情问题,此时人们的感情需要也不是十分强烈,很多打工者说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体力活,一下班就睡觉,要加班,觉就睡不够——哪有功夫去酝酿感情?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就是在乡村里,夫妻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费孝通,1985,40—41页)夫妻一方外出就业,另一方留在家是家庭决策的结果,也是家庭分工的结果,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经济目的,为了生存的需要,在此之上的感情需要自然被暂时放置一边,因此很多人接受调查时根本就想不到外出对夫妻关系还会有什么(坏)影响,这种思想在40岁以上的中年人那里不少。安徽省颍上县一个46岁具有初中文化的村民小组长说:“家里的人外出干活,女人是高兴的。月月给她寄钱,她想买什么,还用钱顶钱,这就好得很,女人有什么不高兴的?男人们外出时间长点也是为了家,女人应当高兴。再说,外出的人一年还回家一段时间,帮家里收麦,妇女有啥不高兴的?”

随着外出人数的增多,青年人的择偶标准与婚恋方式发生变化,不少青年人在外打工过程中相互接触多,产生感情,自由恋爱结婚。无为县赫店牌坊村这种情况较多,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家庭由于夫妻关系是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之上的,因此感情的成分多一些,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牌坊村竹园队的汪孟田夫妻俩日子过得比较苦,但是夫妻关系没有受到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结婚前大家比较了解,现在夫妻关系很好”。<sup>①</sup>

从调查的总体上看,外出就业对夫妻关系没有坏影响,相反却有积极影响。由于外出挣到钱,加上两地相思与“反思”(想着对方辛苦),增进了夫妻感情;在夫妻共同外出就业过程中,由于夫妻接触,相互制约没有减少,加之在外同甘共苦,共同创业,双方感情加深。另外,由于外出就业自由恋爱增多,改善了夫妻关系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利于促进夫妻关系和家庭团结。应该看到,夫妻关系变化过程中外出者的就业目的、就业特点始终在背后发生作用,大多数夫妻十分清楚外出就业是为了挣钱养家,外出就业是不稳定的、暂时的,最终还要“回流”到家的。就业者的经济地位不高,农村社区舆论有压力,传统观念还在起作用,因此,无论外出就业时间长短、无论以哪种方式外出,总体上夫妻感情至今没有受到明显挑战,有时还有促进作用。

## 2. 坏影响

也有夫妻关系在一方外出就业过程中破裂的,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是外出前夫妻关系不好,甚至因此而外出的。牌坊村十几年来,只有一户妇女外出打工跟人私奔,造成家庭破裂,这个妇女是从四川远嫁过来的。据村干部讲,“平时在家(她)就不好好干,出去七混八混的,跟人家鬼混,跑了。”<sup>②</sup>二是夫妻一方在外就业过程中另有新欢而导致夫妻关系紧张甚至破裂的,这有三种情况:第一,夫妻分离时间长,第三者乘虚而入。上面提到的四川个案丈夫长期在外放蜜蜂,与别人同居不回来。第二,发了财,看不上配偶,主动找到第三者或者第三者插足。赫店乡有少数包工头在外有相好的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赫店乡党委

① 汪的妻子是湖北人,是他在湖北做生意时认识的。

② 村干部的评价可能带有偏见,但是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原来夫妻关系就不好。

方书记介绍说：“外出打工回来的离婚率要高一些，越有钱越离婚。具体数字没有，但有一些事例。昨天我还遇到一个，在芜湖的一个人，他老婆是我们塑料厂厂长的女儿，离婚了，2个孩子，一男一女，没办法。刚才我讲的那个赵瑞发<sup>①</sup>去年也就这个时候和他老婆一道回来要求离婚，最后我们做工作做好了（夫妻重归于好）。”第三，因外出感觉到自身价值很高，有较大选择范围，而不再安于以前那种生活，从而对原配不满意，造成感情裂痕的。方书记说：“最近我们家里有个妇女主任姓周，不认得字，过去在外打工的，回来以后任村里妇女主任，我们家里搞计划生育任务比较忙，不愿干了。她打扮得很漂亮，涂口红指甲红。她不干（妇联主任）了，跑的了，蹲了半年以后吧，今年春上回来了，跟她爱人离婚。她是到北京吧。（她）那么年轻，长得又漂亮。男的在家田都做不熟，男的龙线<sup>②</sup>一点，没出息。”

就目前情况看，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就业过程中夫妻感情受到不好影响的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夫妻感情得到程度不同的增进。

## 二、家庭权力

家庭权力，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家庭遇到事情时谁作主、谁说了算数、谁拍板，能说了算的那个人就有权力。因此我从在家庭盖房子、婚姻、日常事务（包括生活、生产、子女教育、人情往来等）三个方面“谁说了算”对外出或者曾经外出过的农户进行调查。

### 1. 老人“退休”

儿女外出就业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他们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上升，成为家庭事务的决策者。相比之下，呆在家里的老人则处于家庭权力的边缘地位——“退休”不再主事。牌坊村曹兴宝、曹兴社等老人都说“儿子在外跑大码头”、“知道的多”，因而盖房子都是他们拿主意，婚姻也随他们自己，偶尔老人也表示一点意见，不被儿子们采纳时，他们也无可奈何，也不再坚持。另外，这些老人的儿子儿媳全在外就业，在日常事务方面老人们即使想插手拿主意也鞭长莫及。谢道生老人有五个儿子，都已分家另住，有三个儿子外出就业，老人对儿女的家务事项多只有建议权，而大多数时候他们也不想管，他说：“他们在外面我们哪管到？”

当然老人权力边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一过程中年轻人与老年人有时会有一些“交锋”，老年人也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退出权力舞台。在牌坊村带我去调查的原村办小窑厂厂长刘长喜老人说：“谢友长很有本事，做一手好菜。他自己在家卤板鸭，让儿媳妇挑着担子在村上卖。他脾气大，儿女们都怕他。”谢友长老人说：“前三年我家就可以搞4间平顶（房），儿子要盖，我没给他搞。”可见老人在家的权力是很大的。外出就业以后儿子的翅膀这两年已渐渐硬起来，面对这些，老人也慢慢软下来，“现在我们准备搞二层楼，前几天儿子他们回来要从窑厂出砖，我没同意。”但是他又说：“儿子要盖房肯定按浙江、江苏那边样式搞。”

### 2. 妻子参政

妻子参政是指妻子参与“家政”，对家庭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丈夫也愿意倾听她们的意见，有时她们还拿主导意见，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提高。牌坊村张明长小学二年级文化，会木工，爱人初中毕业，夫妻俩一起外出做过板鸭，有2个小孩，父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外出回来以后张明长在家做家具卖，爱人在村面粉厂当会计。张明长说：“家里一般事情（我）跟家

① 在北京当包工头，1995年一年赌博、送礼、请客吃饭花64万元。

② 方言，意指“不利索”。

属协商,大事我说了算。”可见,老人的意见已无足轻重,年轻一代已是家庭的中心,在这一中心里权力的重心仍在丈夫一边,不过妻子的意见已被重视。

少数妻子外出以后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外出就业返乡后任乡敬老院院长的谢士兰在一个大家庭中率先外出就业,先是当保姆,后是让丈夫和她一起外出到江苏做板鸭,做板鸭有了钱之后她为三个小叔子娶妻盖房,先后把4个小叔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带出去和她一起做生意。在这个有18口人的大家庭中她成了“总管”。在谢士兰家里,不仅是老人处于权力的边缘,就是丈夫也处于次要地位,她居主导地位。

### 三、权力、权威与团结

在人们外出就业过程中,一方面是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动,另一方面是家庭权力关系的转换。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动并未对家庭团结造成震荡,相反,家庭成员之间更加团结,感情更加深厚。家庭团结更加紧密的原因在于,人们外出就业引发或加速的家庭权力结构变动所产生的权力秩序,先赋性因素减少,自致性因素增多,人们在外出就业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实践表明了自己的实力,从而在家庭中建立起较高的权力地位。新的权力是以个人品质与能力为基础的,大家对它是自愿服从,因而这种权力实际上已是权威。权威与权力相比不具有强制性的因素,韦伯认为权威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权力,而合法性可以通过信仰体系获得,“所谓信仰体系,就是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服从某种统治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它为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转引自苏国勋,1988,189—190)韦伯认为有3种权威(authority)或统治(domination)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以及卡里斯马型。农村家庭权力结构的变迁实际上是在“法理”的帮助下由传统权威向个人魅力型转型过渡。当然这种所谓个人魅力型权威获得以后又会受到“法理”的保护而制度化为一种“法理——个人魅力型权威”。权威的授予与获得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詹姆斯·柯尔曼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权威是指拥有控制他人行动的权力”,而权威的授予与获得是人们经过思考为了增进个人利益而作出的理性选择,是行动者之间社会交换的结果。

在家庭内部旧的权威衰落,新的权威生长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动并没有引起家庭成员关系的紧张、家庭结构的混乱与无序。另外,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的情感因素增多,特别是婚姻逐渐以爱情为基础,这些又有利于家庭内部形成以个人能力与品质为基础的新型权威。家庭团结与家庭权威是相互促进的,成员之间关系密切有利于认同、产生新的权威,新权威又有利于加强团结。因劳动力外出就业而使家庭内部出现的新的权威人物,由于其个人继续社会化,现代性增加,因而这种个人魅力型权威是新型的,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的基础。

不过,农村家庭传统结构影响力仍然很大,要想彻底实现权力结构转型,建立完全新型权威要走的路还很长。

参考文献:

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苏国勋,1988,《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柯尔曼,1990,《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理论部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谭深